



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

——以婚姻為定位的考察

陳 翠 英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

——以婚姻為定位的考察

陳 翠 英

陳翠英君，本校八十三學年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本論文由樂衡軍教授、張亨教授共同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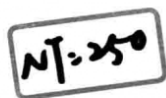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一〇一：
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
——以婚姻為定位的考察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主編者：古 偉 瀛
 周 學 武
著作者：陳 翠 英
發行者：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231-3615·231-3616

ISBN 957-9019-95-9 平裝



Discussing on the Values of “Shih-Ching Novels” by using the fixed examination point of marriage

Much new space has been opened up for research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Shih-Ching novels”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related materials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Coming from the angle of marriage,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system of values contained in three such works: the *Ching P'ing Mei*, the *Hsing shih yin yuan chuan* and the *Lin lan hsiang*.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emerges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women in the various levels of life experiences of human relations, the family, and society, including the forming and loss of passion as well as the disparity and conflicts of the sexes and the approach and selection of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ir lives.

Chapter I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occupation and research origin of these “Shih-Ching novel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ains the study topic and method, as well as roughly depicts their accorded theories. By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this study, the authors, works and readers, this dissertation emphasizes the openness and fluidity of their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s serves as the feminist concepts of “today’s read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ites Mikhail M. Bakhtin’s dialogue, his “polyphonic novel” theories on arguments, and emphasizes multi-angled examinations, thus, clarifying the differing ideologies that have been intermingled within the texts. Chapter III tra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raditional femininity. It especially stresses the hidden conflicts and variables between the sexes in the model of marriage under the concept of “males are superior to females” an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family values, as well as includes the hardships that women experienced in polygamous households, and act as the guide to explain these novels. Chapter IV fully clears up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Chin P’ing Mei*. In addition,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es from the angles of passion, money, sex, and power.

The fifth chapt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in the *Hsin shih yin yuan chuan*. It also examines the conflicts and inequaliti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and the fall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atriarchal order as well as emphasizes the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toward human nature in these works. The sixth chapter us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alented and virtuous 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emotions and rationality to describe the sentiments between spouses in the *Lin lan hsiang* and the mutual love and jealousy between wives and concubines, and also offers varying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 mainstream

standards. Chapter VII wraps up the dissertation by discussing the inductive result of the various values in married lives, stressing how plentiful and diverse the world of novels is.

On one hand, this dissertation trace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se works and emphasiz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it follows western academic theories and stresses the utilization of new vocabulary and looking at classical novels in a new light. Then, it makes a comparison of these new methods to the conventional ones, thus, crossing both space and time. In reality, new feminist concepts have allowed us to rethink the gender structure withi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marriage and, thereby, revealing the flaws and blind spots of putting such importance on patriarchal based values. The novels that Bakhtin stresses are “heteroglossiac” and “anticanonical” characteristic. Thus, they match the containing power of the complete openness in the “Shih-Ching novels”. Besides bearing witness to mainstream models and the differing natures of ideas hidden within a culture and varied spiritual structure of the masses, such works also clarify the war waged by differing ideologies. Under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multi-conceptual examinations, classical novels take on a new meaning of liberalism and fluidity. Even after being ceaselessly passed on, culture will always possess an everlasting vitality.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世情小說之定位	1
第二節 研究緣起	7
第二章 研究題旨與研究取向	27
第一節 討論小說“價值觀”之可能	27
第二節 探討小說“價值觀”之徑路	30
第三章 世情小說的兩性關係及其相關問題	
——從傳統女性的歷史處境說起	53
第一節 傳統規範下的兩性關係及婚姻架構	53
第二節 「多元」觀點的考察	63
第四章 貪欲．財色．權力：	
《金瓶梅》兩性世界重探	79
第一節 從文化脈絡看《金瓶梅》的情色書寫	79
第二節 《金瓶梅》「戒世」義旨平議	86
第三節 《金瓶梅》的兩性世界	101

第五章 父權秩序的顛覆與持守：

《醒世姻緣傳》的婚姻觀 149

第一節 婚姻主題之一：果報 149

第二節 婚姻主題之二：變奏 154

第三節 婚姻主題之三：複調 180

第六章 情理糾葛與義結同心：

《林蘭香》的夫婦情緣 211

第一節 夫妻情結：才德衝突與情理難兼 211

第二節 妻妾情誼：相嫉、相知、相惜 238

第七章 結論：綜論生活價值之歸趨 261

一 父權架構的多重省思 266

1 從縱情恣欲到以理制情 266

2 「男尊女卑」的鬆動 270

3 貞節觀的兩極表現 271

二 婚姻生活中的宗教意識 273

1 果報命運觀 273

2 儒釋道合流 277

參考書目 29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世情小說之定位

在一個資訊交流頻繁捷速的時代裡，文學思潮的遞嬗，也隨之日趨多元化。跨學科的研究走勢推動之下，科技應用登入了文學領域，文學批評更是面臨新視野的開拓，新的詮釋觀念及解讀方式不斷湧現。另一方面，在文學的殿堂中，「汰舊揚新」卻也不致是唯一的律則，不僅傳世久遠的經典之作無慮於時間的檢驗而歷久彌珍；甚至原來被遺忘在歷史一隅、或是受縛於惡名而遭禁絕的作品，伴隨著文學環境的改變，以及政治、社會思潮的調整，也得以重獲定位。以中國古典小說為例，傳統載道文學觀念影響下，小說在文學史中一向居於邊陲地位，創作者怯於認同，無數的作品僅以化名或別號傳世，憑添小說史疑案。或是成為鞏固政權、教化取向的犧牲品，許多作品或遭官方禁絕銷毀，或藏諸秘閣，（註一）甚至因此流落海外；小說領域遂劃下了禁區，後人難以窺得全貌。近數十年來，隨著文學觀念的變遷，逐漸提昇小說在文學傳統中「不入流」的卑微身份，（註二）納入古典文學研究的主流，扭轉了以往的弱勢。原來被視為禁忌的作品可以一躍而為炙手可熱的研究對象，如《金瓶梅》；（註三）其他許多塵封經時的小說，如今亦在新觀念新尺度的審視之下，紛紛解脫歷史厄運，重閱人世。近二十年來典籍整理、刊

行的腳步日亟，大量明清之際的作品相繼出版，（註四）或重新獲得討論，小說史也因此呈現了新的風貌。

我們看近年來所出版的小說史，（註五）與以往同質作品相較，最大的不同在於改變了傳統循時演述或分期論介的觀點，出現了以類相屬的小說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按時代發展前後論述時，雖亦已兼顧類別劃分，（註六）不過彼時明清小說尚未大量刊行，因此其說亦只是樹立了骨架，而尚缺豐富血肉。近年來的小說史，則有在各類作品為統攝綱領之下，依年代先後論其發展者，（註七）如此各類作品遂皆有了比較完整的面貌；甚至有探討各種小說類別的專史問世。（註八）

在各類小說紛紛重新在小說史上擴充席位之際，以描述世態人情為主的世情小說（或稱人情小說），無論作品刊行、論說研究，收穫堪稱尤為豐實。古典小說在明清進入文人大量獨創的階段後，由於創作觀念逐漸成熟，作品風貌日趨多樣化，各類流派亦相應而生。（註九）傳統神話志怪、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題材仍有所傳承，另一方面以反映人情世態為主的作品亦大量湧現，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之一。此類小說因為有許多作品關涉風月情色，以往禁絕最甚；亦因其整體風格駁雜，目今學者的評價不一。（註一〇）然而隨著文學觀念的開放，這些以往被視為禁忌的作品，得以紛紛自歷史的禁域釋出。前述《金瓶梅》之外，最近兩岸對明清之際許多被禁絕的言情、艷情、甚至色情小說展開大量的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亦是明顯一例。（註一一）

明清這批包括艷情小說的作品，在小說史上原是屬於同一創作

潮流的產物。早在二十年代，魯迅即明揭「人情小說」、「世情書」之詞，（註一二）介紹了以《金瓶梅》為首、以迄《紅樓夢》及其續書的幾部著作，可說是對此類小說的起源、風貌特色以及發展脈絡，作了初步的重點考察，（註一三）確立此類作品為中國小說史上重要的流派，也指出了研究的方向。隨後相關著作如文學史、小說史，或踵繼其說，或就《中國小說史略》所構建的論點予以擴充。惟限於資料的匱乏，仍然大多只作點的觀察，或書目的著錄。（註一四）直至新資料相繼大量出版、翻印問世，確立了此類以往因為藝術成就不高、或內容犯禁而致湮沒不傳的作品，乃是小說史上縱延明清兩朝、蓬勃一時的創作主流之後，相關的論述日夥，儼然已在小說研究的領域中，新闢了一塊疆土，也開拓了新的研究路向。彷彿以往蟄伏地底的潛流，終於結束了與世睽隔多時的歷程，重新以活潑的生命力流竄人間；小說史上原來隱晦不彰的一頁，亦得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再度朗現。（註一五）

回溯魯迅的相關論述，在提挈簡要的綱領之外，也留下了寬廣的論說空間，允許後人作不同角度的定位及論說。首先在名稱方面，對此類以描述世情為主的作品，學者的命名即未臻一致，而有「人情小說」、「世情小說」、或「人情世態小說」之別。（註一六）雖然諸說意涵相去不遠，然而衡量「人情」、「世情」二詞，著一「世」字，似更能點出「俗世」、「現世」此一生活場景的現實意味，乃是直指當下人間、凡俗庶民俯仰其中的生命舞台，既非遙遙遠古，亦非殊方異域；「世情」一詞，亦能切合此類作品描摹世態百相、人情萬端的豐富內涵。因此本文將逕以「世情小說」統稱之。（註一七）

儘管諸說不一，學者們所論大率指涉反映世情萬象的作品；而確立其為明清小說創作主流之一，亦殆已成為小說史的定論。一般咸認為《金瓶梅》是世情小說嚆矢之作。《金瓶梅》之後，世情小說與其他兩大小說主流互相滲透，（註一八）其後發展即像河川蔓延，諸流來匯，（註一九）縱延明清兩朝近三百年，（註二十）蔚為小說史上的一大流派。這些作品在取材、風格方面，承繼了宋元明話本以來的寫實特色，細膩地描寫現實塵寰中，生命相親相離、悲歡聚散之事；市井風情、滄桑人間，這些特徵樹立了世情小說的整體風貌，遂亦成為後世判準世情小說的主要依據。人間的愛欲情仇、哀樂離合，本來就是文學作品的恆久主題，這方面固非某類小說所獨擅。六朝時《世說新語》初具志人色彩，從篇目的分類、命名，可知編者乃有意捕捉人物言行的記錄，人物品鑑成風，舉止吐納之間，生命的風姿、意態，乃至人性的衝突，皆有微而具體的表現。（註二一）即使張皇鬼神的志怪小說，透過種種具體言行表呈，則幻想、神異的情節，每每仍是現實世界人性底層欲望的流露。（註二二）唐傳奇中，觸及人性的道德理念、理想追求等問題，進一步展現了人子的豐沛生命力，洋溢著對現世的熱忱。（註二三）魯迅曾稱世情小說源於唐傳奇，（註二四）從反映人事人情這個角度觀察，唐人傳奇確實已是生命的深刻見證。宋明話本的文學樣式，及其題材方面更是以市井庶民為關切焦點，而為世情小說蓬生的直接淵源。（註二五）明清以後，神魔志怪、英雄傳奇、歷史演義等長篇章回蔚為小說主流，不僅體裁、語言為世情小說所承襲，人性的刻劃更是紛然呈現。例如《水滸傳》，論者即謂「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註二六）而《金瓶梅》全

書情節即取之於《水滸》中武松、潘金蓮故事加以鋪敘衍化而成，特在風格上更趨寫實。（註二七）

然而若自整體的風貌觀之，除了宋元明話本是以世俗雜瑣的萬象為關切焦點，其他作品的基調畢竟不是以人情世事為描述重心，而有與世情小說殊異之處。六朝乃小說創作尚未自覺的年代，作品不過略具小說雛形。彼時文人並非從“文學”的角度創作或衡量作品，小說籠罩在神話的蒙昧之中，並且與史實糾纏不清；人性的顯現，終究如熹微晨光，縹緲而薄弱。（註二八）唐人傳奇，重在個人意志之奮揚、理想之執著，其反映的生命情調，基本上是浪漫而超絕塵谷的。（註二九）而明清以後的長篇小說，或是英雄文武，崢嶸叱吒，重在呈現理想的追求與失落；或歷史興衰，乃是既往記憶的演述與批判，這些小說所展現的生命舞台，殊非以世俗中人為搬演的主角。志怪神魔，亦只是透過神怪情節，對人性作間接的投影。

因此從流派類別考量，上述作品在描述人情世象方面，並未能蔚為一股創作巨流而湧現大批小說群；相較之下，明清的世情小說，蘊涵了宋明話本以來所流露的庶民意識，表現了濃烈的人間色彩。宋朝是一開展新局面的轉折時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帶動了庶民階層崛起，無論是生活樣式、意識型態、乃至社會思潮，都注入了屬於市井庶民的活潑生命力。（註三〇）世情小說的創作之所以蔚為時代的風潮，沿波討源，前述六朝、唐人小說在小說史的傳承上固然皆有間接影響，然而論及直接孕育的力量，則殆為宋元明話本。白話文在宋人流行瓦舍勾欄中說書時即趨成熟，歷經後人運用，自宋以降，可說即是以白話為主流語言。世情小說一方面承襲了宋明話

本此一形式上的特徵，語言生活化、口語化，尤其人物的對話更是生動活潑，聲口肖妙。(註三一) 另一方面，描寫世情、觀照世事，可謂此類作品最突出之特質。此一傳統之源流，亦可遠溯至宋明話本。話本之作，往往取材於現世時空中習見習聞之事；世情小說所寫亦多在耳目之內、閭閻之間，其濃厚的俗世色彩，較之前述諸類小說，毋寧更切近對生命、人性的關懷。我們從作者大量的小說序跋及批者的評點，即可知文人往往寫作動機明確，乃是出乎自覺地反映現實。凌濛初自述編寫初、二拍，乃取材自「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初刻序)；睡鄉居士則批判「不知無奇之所以為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驚于幻誕」(二刻序)者不可取。因此當下發生的現實新聞、乃至社會事件，目見耳聞，無不可寫。(註三二) 這種寫實取向的特質，(註三三) 到了長篇世情小說，同樣延續了對現世俗事的關注。欣欣子序《金瓶梅》，謂其「如在目前始終」；是「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日本學者喜用“庶民性”一詞，(註三四) 亦切要地表現了世情小說的特色。另一方面，世情小說更將寫實的筆觸伸遠，將背景大幅拉向家園以外的遼闊世界，對社會朝政表現了高度的關懷。證諸寫實主義所標榜的主張，如「寫實主義堅持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連」，(註三五)「小說是整個時代的作品」；(註三六) 以及強調「“各階層”的生活的活動畫片」，(註三七) 世情小說所關懷的世事滄桑、國祚興亡，與個人生命實深深相連。論者喜用「社會生活長卷」、「風俗畫卷」、「寫真」等語詞來強調世情小說的寫實風格，(註三八) 則這幅畫應該是一幅工筆畫，作家用極繁複的筆觸，開展小說中的生活場景，從閨閣衽席、閭巷市廛，歌樓舞榭，乃至宦場宮庭，舉

凡娑婆世界中，生命停駐留連之處，作家無不——點染具現。而描摹人物，亦出之以細筆刻畫。論者總括其整體風格，乃是「從大到小，從外到內，從遠到近，從粗到細」，言簡意賅，事實上是很貼切的說明。（註三九）人物不再是叱吒沙場的英雄豪傑，而是在柴米油鹽中搏鬥掙扎、涕泣歡笑的升斗小民；作品亦不再有刀槍交戈、快意恩仇的磅礴氣勢。其次，小說中人物的生活場景是當下所見，所謂「近距離透視」，人物所憂所懼——無所遁形。而作家不僅熱忱地將世事、世情以文字塗抹為一幅幅的寫實畫卷，並且同樣延續了文人關切世事、以及以文學為載道工具的傳統，在小說中寄寓了一己的批判，有意針砭世俗。欣欣子說《金瓶梅》「寄意於時俗」，實則亦足以代表世情小說的普遍特色。因此從宋明話本此類「前世情小說」追溯，（註四〇）復與《金瓶梅》為始、其後蔚為大觀的世情小說並觀，當更能清楚掌握後者之特色；對小說之脈絡發展，亦能有更全盤之瞭解。

綜觀世情小說對一般人生展開了全幅的觀照，大多以婚姻、家庭為情節描述軸心，擴及點染世態人情，並進一步將關懷的層面延伸至家國興亡。歸納言之，兒女婚戀、家庭倫常、世情百態、國祚興衰為其普遍關切的對象，這些題材往往形成網狀的結構脈絡，各敘述線索糾繞牽纏，因而開展了紛繁多元的生命圖象。（註四一）

第二節 研究緣起

以上概述世情小說的一般風貌，重在強調其整體特質。由於這

股創作潮流縱延兩百多年，因此不僅表現了階段性的特色；即令在歷史條件相近的時空下，亦往往由於作家個人心靈的機杼獨運，作品因之各具風姿，並非一、二要點即能概括其詳。前述宋明話本為《金瓶梅》之直接淵源，然而除了《金瓶梅》之外，又有擬話本亦沿襲其風，遂如百川交匯，各有去處及流程，而有世情小說異流、支流、分流，以迄末流之說。世情萬象遂成為明清小說創作之共同因子，亦可說世情小說與其他兩大創作主流互相滲透，小說遂呈現多樣的風貌。（註四二）回溯魯迅有關的論點，其說雖簡，但觸及了此一類別的起源、題材取向、發展演變，已大致勾勒出世情小說的輪廓及特徵。後人賡續其說，亦多就上述論點、範疇繼續作更深入的探討。或以單一作品為對象作“點”的觀察，多就有關作者、時代、技巧等問題作全面的探討，迄今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註四三）另一方面，伴隨著作品的相繼問世，對於世情小說發展脈絡、源流去處，提供了比以往更豐富的訊息，相關研究亦浸漸至於流派演述，以及歷史流向等課題。然而新的小說史頁既經展開，也因此引發了一些問題。前述名稱上的分歧，猶不致構成異議；以個別作品為研究重點，亦可以自成一說。至於進一步自小說史的觀點作範圍釐清、溯源探流，以及探討藝術風貌等，這些論題互相糾纏關涉，（例如類型劃分即影響到風格的鑑賞與確立），則還是一個猶待充實的論戰場。由於魯迅對世情小說的義界並未作明確範圍，除了公認《金瓶梅》是世情小說的奠基之作，論及其後的發展、流派，學者們的說法或寬鬆，（註四四）或劃分較細，（註四五）彼此認定遂有不同。如何確立範疇、釐清派別，以定其義界？其源始、流向、發展若何？如何與

其他小說類別劃分涇渭？類此歷史性的研究，前文述及已有許多小說史關注，甚至有專書討論者。然而由於這方面的認定，須另以取材、技巧、風格，甚至作家的寫作動機為判準依據，若將篇幅納入考慮，則所得又有不同。牽連既廣，有俟廣羅旁蒐，並顧及主、客觀的條件，便不是一個容易有定論的問題。例如較寬鬆的說法，將《金瓶梅》之後的世情小說分為四－五派，即家庭、才子佳人、猥褻（或稱艷情）、狹邪、兒女英雄等。（註四六）儘管有學者認為此說過於寬泛，（註四七）但是魯迅其實已將才子佳人小說、狹邪小說等皆納入世情小說之流。因此筆者認為或許不必要執著於派別之分或強立壁壘；把握時代的文學思潮，彰顯各派特色，如此對於小說的類型特徵、美學風貌，或可以有更細緻的劃分。（註四八）

在前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下，本文並不打算從宏觀的角度對世情小說作全方位的考察，而是嘗試從婚姻角度切入，就特定作品擷取多重論點作專題研究，期能透過婚姻、家庭及由此延伸的相關主題作一普遍性的觀照，以了解此一流派作品，對人生的省思開展到什麼幅度？對生命個中底蘊，又究竟探索幾何？

在傳統小說中，愛情、婚姻是相當普遍的題材，至世情小說，此一主題尤為作者關切的焦點。婚姻關係的建立，肇致了種種現實因素如家庭、經濟、社會、政治的糾葛與牽纏，往往是人物關係網絡的焦點；而權力的爭鬥、財富的徵逐，亦成為問題的輻輳點。「婚俗總是三種因素的混合物：本能、經濟、宗教」，（註四九）婚姻關係開始，家庭生活各層面皆為之變化；「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多」（《續金瓶梅》四十三回），夫婦之間的恩怨情仇，往往更是顯出世事